

寻找你的名字，重温你的故事

一份不断延长的英烈名录



新华社记者胡锦涛、赖星

于都河畔，月亮攀上了故乡的屋檐。
江水起伏光点闪烁，像是一颗颗跳动的归心。

80多年前，你告别家乡，踏上征途。
中央红军8.6万余人的长征队伍，仅剩3万多人。无名烈士，难以计数。

你的名字，化作散落的红星。
人们一次次沿着你的足迹，寻找你的名字；人们一遍遍走进历史深处，重温你的故事。

你的故事，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记忆。
你的精神，铸就一个民族信仰的丰碑。

你的名字，是散落的红星

“始生三月而加名”，“男子二十冠而字”。对于中国人而言，名字是一个人人生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

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于都，英名墙上16356位烈士的名字依籍贯整齐排列，这些金色的名字在红褐色大理石上熠熠生辉，而据碑文所述，“犹有数以万计之烈士，姓名无考，故有留白，喻其圣洁。”

红色，是于都最鲜艳的底色；长征，是于都最动人的记忆。其中，既有国情，也含家思。
苏区时期全县6.8万余人参加红军，几乎每5人中就有1个参加红军；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烈士倒下。

然而，在长征途中倒下的万余名于都籍烈士中，只有少数人的事迹被记载流传，另有6643人北上无音讯，而绝大多数连名字都没留下。“这样的对比，让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黄发斌深感痛心。

英雄走时，虽然无名；英雄走后，不该寂寞。为寻访烈士英名，补全英烈事迹，2019年以来，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队员两次外出寻访，行程超过一万公里。

一路上，寻找到的每一条线索，核对过的每一组数字，英烈后代的每一次回忆都让他们感受到，越是走进历史深处，越是发觉历史的沉重。

广西，全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他们看到一处开阔的石头阵，每块石头下面都安葬着无名烈士的遗骸，与周围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融为一体。

贵州，遵义红军烈士陵园。英名墙上镌刻着1338个英烈名字，“90后”队员蔡铭对照于都籍烈士名录一个进行核对，看着这些和自己年纪一般大就牺牲的战士，他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

身处广阔无垠的若尔盖大草原，一股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淌流而来。黄发斌情不自禁地哼唱着《长征组歌》，“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杨振德写给女儿邓颖超的亲笔家书

“我和老太爷一切如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切，价昂二三倍以上。此地民风，皆习惯勤劳，十之八九，均可自食其力。虽感生活太高之苦，但地方民情，尚称安静……”这是邓颖超母亲杨振德写给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的的一封信，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位母亲对女儿女婿的挂牵。

这封家书如今被保存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信纸长25厘米，宽22.5厘米，共2页，是杨振德用毛笔在黄色熟宣纸上书写的。

信信封有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为直式，封面上印有红色长方形框，杨振德毛笔手书“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卢竟如先生收请劳妥转邓颖超先生亲启 贵阳青岩镇寄”。

“这封家书的内容不长，字迹工整，遣词用心，语言朴实，看得出来，杨振德是一位有知识、有文化的女性。”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陈列保管部副主任李勤说。

李勤介绍，1876年，杨振德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市的一个仕宦家庭，自幼酷爱读书，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深受父亲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影响，年幼的杨振德就萌生了寻自由、求解放的热切愿望。14岁时起，她就懂得，妇女要自尊自爱，首先要自强自立。

25岁时，杨振德与一位广西武官邓廷忠结婚，后生下女儿，取乳名玉爱，学名文淑(后由本人自己改名为“颖超”)。“作为女儿的启蒙老师，杨振德一直非常重视对邓颖超的教育，即使日子过得清贫，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女儿的教育，她独立自强、逆境

那些妈妈写给我的信



一名老红军后代在于都烈士纪念馆英名墙上寻找亲人的名字(资料照片)。

“对于英烈来说，留不留名或许并不重要。但作为后辈，我们有责任去寻找，这既是对烈士英灵的告慰，也是对家国记忆的延续。”截至目前，黄发斌等人已找到7名散落在外的于都籍英烈，另有280名英烈的相关信息有待进一步核实。

你的名字，是不朽的丰碑

如果以人数算，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找到的名字并不多，但每一个名字都弥足珍贵，字字千钧，蘸满了家国情怀。

2019年7月，河北省石家庄，烈日灼人。

寻访组队员赖金玉风尘仆仆地赶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得知她的来意后，陵园相关人员深受感动，并将江西籍烈士的相关资料交予她。

赖金玉从中找到了杨承德、邓典龙、钟奇等三位英烈的名字。隔着八十余年的光阴，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

“他们长征到达陕北后，都在抗战中牺牲，但家乡的人们并不知晓他们的经历，更不了解他们的事迹。”赖金玉回到于都后，便着手联系当地电视台为烈士寻亲。

一年后，赖金玉接到了一个来自唐山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大姐说，自己的父亲赖富和钟奇、邓典龙是战友，他们的名字均在父亲的回忆录上出现过。

赖金玉等人循着这一线索，逐渐确定了钟奇、邓典龙等人于都籍的身份，他们的相关事迹也愈加清晰。

“河北之行的收获，给了我们很大信心。”2020年10月，黄发斌带队沿长征沿线进行第二次寻访。

在贵州黄平县，他们亲历了一场阔别八十余年的相逢。

“于都老家来了人。”见到黄发斌等人，失散红军钟兴明(又名钟元亨)的子女们热泪盈眶。

钟兴明是于都靖石乡人，在长征途中因伤掉队留在黄平县安家。他曾告诉子女，在黄平牺牲的红军战士中有很多是于都老乡。找到这些战友的遗骸并将其安葬，是老人生前未了的心愿。

老人去世后，当地村民在修路时才偶然发现其中一具红军烈士的遗骸。据党史部门考证，1934年12月，这名于都籍战士被在此设伏的敌人杀害。

黄发斌一行人随钟兴明的女婿张礼平来到这位无名英烈的墓前。墓碑无言，像一双深沉的眼睛凝视着站在它面前的人。

众人深深鞠躬，伫立良久。

长征沿途，散落着难以计数的无名英烈，或因负伤、或因疾病牺牲，还有的为不当俘虏而选择跳崖，有的则被敌人集体坑杀。多少年来，这些忠魂埋骨他乡，他们生前有过怎样的期待呢？

你的名字，是永恒的信仰

长征，是时代留给这片热土血脉相承的烙印。

46岁的肖庆根是仙下乡西洋村第一书记，他从未想过自己和强渡大渡河的红军勇士会有怎样的联系。

于都河——大渡河，山水相隔1900余公里。

直到2020年10月，于都县革命烈士纪念馆寻访工作组来到位于四川石棉县的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

在强渡大渡河的十八勇士名单中，他们发现，其中赫然写着“萧汉尧”三个字。莫非几十年遍寻不到的肖汗尧，就是他？

“我们将从于都带去的材料和四川方面记载的姓名、部队编制等信息进行比对发现，这个‘萧汉尧’就是我们于都的肖汗尧。”黄发斌说。

肖汗尧，1930年参加革命，长征后“北上无音讯”。

肖家长辈只知道肖汗尧参加了长征，却不知他的下落。他们担心，当老人们逐渐过世，“肖汗尧”这个名字所承载的一段记忆会慢慢褪去。于是，根据赣南风俗，肖庆根的父亲肖湖北在年幼时被过继给肖汗尧。

“肖汗尧是我叔叔，我奶奶等他们等了一辈子。临终前，都还在念着他的名字。”年近七旬的肖湖北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叔叔知之甚少。

从黄发斌口中得知肖汗尧的事迹后，肖湖北和家人喜极而泣。原来，他们从小便知道的“十八勇士”中竟然有自己的至亲。

“这一定是特别的缘分。”肖庆根在八一建军节那天出生，后报名从军，是一名有着16年军龄的老兵。2017年，他被选为西洋村第一书记后，便扎根基层，带领村民从脱贫致富迈向乡村振兴。走过八十多年风雨，这片土地上的红军后代，正传承着祖辈的长征精神，续写着新的报国传奇。

在于都，以长征、红军、长征源命名的学校、街道、场馆比比皆是，长征精神与其中蕴含的红色基因，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里流淌。

数日前，一场淋漓的春雨，洗尽了英名墙上的尘埃，碑文愈显清晰——

“岁月沧桑，烈士之遗骨无以觅焉，唯余英雄事迹，为后人念也。”

新华社南昌4月11日电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六面碰壁 一诗明志

“六面碰壁居士”，一位曾经叱咤风云将军的狱中自称。
从1941年到1945年，新四军军长叶挺遭遇了“六面碰壁”的扣押。他以“六面碰壁居士”之名，写下一首名为《囚歌》的诗，道出了心声——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1941年1月4日，安徽泾县寒风呼啸。

此时，虽然国民党屡屡挑起摩擦，但共产党一直以抗战大局为重。十几天前，新四军军长叶挺率军及所属部队9000人，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沿事前经国民党军事当局同意的路线北移。

次日，行至茂林地区，猝不及防的新四军，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围攻。

叶挺与战友们被迫还击，激战7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战场谈判时被扣押。

国民党诬蔑新四军叛变，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这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周恩来满含悲愤，挥笔质问：“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身为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交军法审判”，从此开始长达5年2个月“六面碰壁”的生活。

《囚歌》中写道：“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到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对于这位有着大将之才的军长，国民党顽固派既心虚、又忌憚，以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劝降。

叶挺起初被关押在江西上饶集中营，后来被转移到桂林七星岩一个山洞里，之后又被转押到重庆。这期间，许多国民党大员和“社会名流”前来“拜访”，以高官厚禄等劝他“识时务”。叶挺的态度则一如他的名字：挺直不弯。

1942年写在重庆歌乐山红炉厂秘密囚室墙上的《囚歌》，结尾视死如归：“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

1944年1月，叶挺被押至湖北恩施。
湖北省恩施市文物局讲解员杨蕾介绍说，在恩施两年多的软禁生活中，叶挺顶着经济来源被断绝的压力，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带领家人在这里开荒种地、饲养畜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

当年他亲手植下的茶树，当地群众称作“将军茶”。

党中央一直关注叶挺的安危，不断与国民党交涉。直到1946年3月4日，叶挺终于获释。出狱仅10小时，他就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因禁期间，就有了这个决心”。

毛泽东亲手修改润色了批准叶挺入党的复电。电文写道：“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

复电抬头，毛泽东修改两次才定稿。

这个抬头是——亲爱的叶挺同志。

(记者徐仕)新华社北京电

两张代表证 五千里跋涉

突破20多道封锁线、穿越800多里敌占区、行程5000多里……历经千难万险，只为抵达延安，参加党的七大。

如今，位于江苏省镇江市的茅山新四军纪念馆，珍藏着两件国家一级革命文物——段焕尧、李珊夫妇的两张“七大代表证”。

这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由夫妇俩同时拥有并保存完好的七大代表证。代表证长8.4厘米，宽6厘米，呈对折的竖方形，紫红绫布镶面，封面没有任何文字或标志，证书号码、姓名和座位号均为手写，内页横印着繁体“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样两张简单朴素的代表证背后，却是一段历经千难万险的5000里跋涉。

1945年的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离上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已经过去17年。

1943年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通知段焕尧、李珊夫妇等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当时段焕尧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副旅长，妻子李珊在二旅卫生部当教导员。

1943年3月，夫妇二人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从江苏东台大桥镇启程。

“一开始走水路遭到敌人轰炸，坐的船被炸了，牺牲了一部分同志。后来，坐火车到山西，从陆上走，还要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大姐……”已经年过八旬的段廷德至今仍能清晰复述父母跋涉途中的一些细节。

一路上，夫妇二人曾被日军包围，段焕尧带领护送部队突围，却和妻女走散，多亏地方干部送回；过汾河时，李珊背着孩子陷入齐腰深的淤泥，幸亏被好心人拖了出来……

与此同时，其他代表也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延安，有的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不仅来自沦陷区，因为交通不便，有的骑马，更多是步行；有的化装成商人、小贩或乞丐；有的由游击队护送，有的从国外辗转归来，有的途中遭袭身负重伤，甚至牺牲……

信仰坚定，一往无前。据段廷德推算，1943年底、1944年初，父母抵达延安，后在中央党校四部参加学习，于七大召开前夕领取到这两张代表证。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段焕尧夫妇手持代表证与750多名代表一起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750多人济济一堂，中国共产党此前的代表大会从来没有这样大的规模，这样隆重热烈！”段焕尧在回忆录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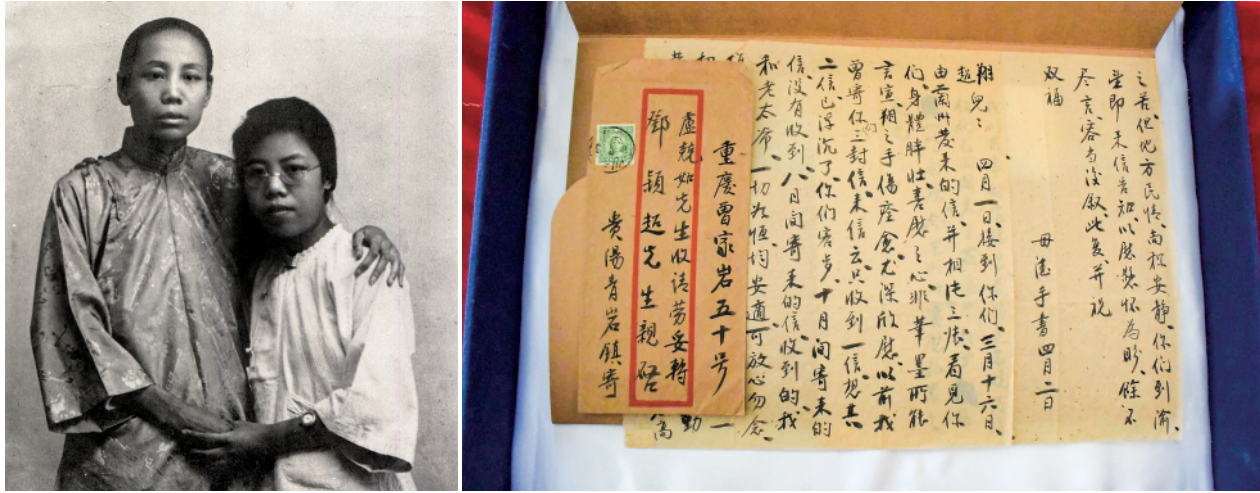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首次明确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深厚基础。

会后，李珊专门做了一个皮挎包收藏这两张七大代表证。无论严寒酷暑、行军千里，这两张代表证一直没离开过她的身边，直至她离世。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两张代表证，见证革命伉俪的坚定信仰，也是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难、一往无前的生动缩影。

(记者刘宇轩)新华社南京4月11日电



左图：1925年邓颖超南下广州前和母亲杨振德(左)在天津合影留念(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供图)
右图：这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拍摄的杨振德写给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的家书(3月31日摄)。

新华社记者周润健摄

求生、乐观向上的意志品质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的女儿。”李勤说。

根据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研究人员仔细考证，这封家书是1940年4月2日，杨振德写给女儿邓颖超和女婿周恩来的，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封杨振德写给女儿的亲笔家书。虽只有短短两页纸，但可以从读出的杨振德与邓颖超之间细腻深沉、亲密无间的母女之情。

既然是家书，少不了报平安的内容。“我和老太爷一切如恒，均安适。可放心勿念。”“信中的‘老太爷’指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日本占领武汉以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接待了一批经桂林转移到贵阳的抗日革命家属，其中就包括邓颖超的母亲和周恩来的父亲。”李勤说。

“惟生活程度，较去年上半年，粮物一

切，价昂二三倍以上。”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当时贵阳的民众生活困苦，物价飞涨。“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杨振德的生活肯定十分艰辛，但即使这样她也没有给儿女女婿添任何麻烦，而是自己默默忍受，这也能看出杨振德是一位很坚强、很独立的女性。”李勤说。

“你们到渝，望即来信告知……我少悬一些念虑。今果如此，实慰私衷之愿也。”李勤说，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杨振德对儿女女婿的牵挂之情，希望他们早日平安归来。

长年坎坷奔波的生活影响了杨振德的健康，1940年11月18日，杨振德因病不治去世。邓颖超在后来的回忆：“我妈妈是一位平凡的妇女，慈祥的母亲，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离的一生，她具有独特的性格，反对一切封建习俗，追求进步，向往大同世界，有自强自

立和助人为乐的精神。她对我的教育和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

专家认为，在邓颖超的青少年时代，杨振德抚养女儿成长，支持女儿从事学生运动；邓颖超走上革命道路后，她又以行医之长，协助儿女女婿从事革命事业。可以说，杨振德的一生，对女儿邓颖超的性格和人生有着深刻影响。综观杨振德的一生，她是一位育女成才的成功母亲，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作为一位女性，她坚强的个性、坚韧的品质、独立的人格，值得后人敬佩。作为一位母亲，她对女儿循循善诱的教育、潜移默化的引导、润物无声的影响，值得后人学习。”李勤说。

(记者邵香云、周润健)

新华社天津4月11日电